

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
资料汇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 编

2

[1936—1939]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18—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二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国外发行 隆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82印张 7插页 1914千字

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书号：10355·106

*A Corpus of Data of
Academic Theses and Works
on Lu Xun (1913—1983)*

(1913—1983)

魯迅研究學術論文·著作資料集

责任编辑：张梦阳

装帧设计：王 堃

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二卷 编者说明

- 一 第二卷收录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之日起，到一九三九年止四年间，有关鲁迅逝世纪念和鲁迅研究的文献资料。
- 二 我室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各大专院校、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界各方面朋友大力支持、协助下，已经根据《鲁迅研究资料索引》，将解放前出版、发表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基本收集齐全，并将原件、复印件、照相件、抄写件按照时间顺序整理成资料全本。但是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全部集印。因此，自第二卷起，对所收集到的鲁迅研究资料开始有所筛选，尽量收录在学术、史实和观点上有新意和参考价值的资料，不再每文必录。由于水平所限，必然有挂一漏万、选录不当之处，订户必要时，可到我室查询资料全本。
- 三 自第二卷起，在报刊上连载的文献资料，将合在一起编印，不再按发表时间隔开。有些研究论文专集，也酌情按成书体例编排，不再按单篇文章发表时间收录。
- 四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以后的纪念文献浩如烟海，不胜搜寻。在这一非常时期里只能采取非常编法，作为特例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照原版编印，另外编有《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十二月底〈鲁迅先生纪念集〉之外的鲁迅逝世纪念文献资料选编》作为补充，为了检索方便并与全书体例相符，另编有《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十二月底鲁迅逝世纪念文献资料时间顺序检索表》，排在逝世纪念资料前边以供查阅。一九三七年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文献资料，按发表时间列出题目，注明在本卷的页码，目录中的题目左上角标*。
- 五 为保持文献原貌，除个别明显错排之外，一律不予更改。文献中的鲁迅著作和其它经典著作的引文，也照原貌收录，未与原著校核，特再次申明，请读者注意。
- 六 第二卷编纂过程中，得到天津市殷玉章同志、北京图书馆柏林寺杂志库冯新秀同志、报库张筱卿同志、善本阅览室郑培珍同志、河南省鹤壁市教师进修学院秦五星同志、延安革命纪念馆刘立保同志以及陕西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等全国各地图书馆的大力支持，特此致以谢意。

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

(1936.10—1939)

四

(1936.10—1937.6)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五时二十五分，鲁迅先生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内九号寓所。

这个沉痛的消息立即震动了中国，震撼了世界。当日，上海《大沪晚报》等各家晚报立即以头条位置报导了这震惊中外的消息：“中国文坛巨星殒落”、“中国文坛失巨星”一类大字标题，客观反映了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和他的逝世所带来的极大损失。

鲁迅逝世对中外文坛、社会各阶层和人们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之广泛和深刻，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就至今的五十年间来看也是绝后的，再没有任何一个文学家的逝世能够在如此众多的人们心灵中产生如此深刻的震动。因此，代表各种思想观念、各种集团利益、各个阶级立场、各个审视角度的各种各样的人们，一时间都对鲁迅逝世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感想，对鲁迅的一生和他的思想、作品、历史地位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显现出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鲁迅观，将鲁迅研究学术史推进到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非常时期。

鲁迅逝世的第二天，即十月二十日，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就在北平寓所“苦雨斋”对北平《世界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谈叙了听到鲁迅逝世消息之后的感慨，并对鲁迅的一生业绩和人格进行了评论，他着重谈鲁迅早年的学术活动和整理古籍的工作。对鲁迅后期的战斗生活避而不谈，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和处世态度则以“处世悲观，批评苛刻”两点加以概括，把鲁迅看成是一位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者。这自然是与真实的鲁迅不相符合的，理所当然地受到许多鲁迅研究者的批评。不过，周作人的这种鲁迅观很有代表性，代表了他这一群闭门养性，逃避现实的资产阶级文人学者的鲁迅观，在鲁迅研究学术史上是值得书一笔的。

站在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立场上观察鲁迅，就得出与周作人等人迥然不同的观念。十月二十一日，上海《立报》发表了一丁的《鲁迅的散文》一文，用“擂鼓”来比喻鲁迅散文的技巧：“在行文的起头，只有咚咚的鼓声，但到中途，忽然轰轰几声，再又是咚咚的声音了，殆及最后，又必轰然几下，但也有全篇尽是轻微鼓声的文章”，“几十年来，鲁迅所敲的，就是一面催促文化界觉醒的战鼓。”把鲁迅的散文比作“擂

鼓”，不仅有利于理解鲁迅散文的战斗意义，而且有益于体味鲁迅散文的内在节奏。

当然，正确地评价鲁迅，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对鲁迅的学术事业也须认真研究。十月二十二日，上海《大晚报》发表了赵景深的《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文章开头就说：“战士鲁迅死了，关于纪念这样一个努力与封建思想奋斗的作者，是应该侧重于他的思想方面的。但我做这工作，能力还不够，所以只好略谈他在中国小说史方面的成就。”根据自己的特长，在研究的课题上有所侧重，与故意掩盖甚至歪曲鲁迅在政治上的革命性是不同的。赵景深本身是文学史家，所以对鲁迅作为中国小说史家在学术上所作的贡献自然有切中肯綮的评论。这是较早从小说史研究领域评论鲁迅的学术文献，是应予注意的。

对鲁迅杂文的评价，是不同阶级鲁迅观中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周作人、陈西滢等人竭力否定、贬低，站在中国民主革命立场上的鲁迅研究者却把鲁迅的杂文看得比他的小说还重要。十月二十三日，杭州《东南日报》发表了何德明的《鲁迅的杂感文》。文章开头就指出：“与其说鲁迅是一个小说家，毋宁说他是一个杂感文作家，尽管《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给予中国文坛的影响甚大；《阿Q正传》一篇且已译成各国文字，博得世界人士的注意，而他在文学上的珍贵的贡献，毕竟还在于他的杂感文。”鲁迅逝世的第四天，就能发表文章指出鲁迅杂文的重要价值，提出鲁迅杂文研究在整个鲁迅研究中的头等重要地位，的确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至今已过去五十年，鲁迅杂文研究仍然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中，是令鲁迅研究界深思的。

鲁迅的逝世，引起广大革命人民的沉痛哀悼，也招来反动阶层对他的更加恶毒的攻击和污蔑。对于这种攻击和污蔑，革命文化界是不能坐视的。十月二十四日，《北平新报》发表了李何林的文章，题为：《为“悼鲁迅先生”——对大公报“短评”记者及其侪辈的愤言》，批驳了反动报纸对鲁迅的攻击和污蔑，指出：应以“深刻锐利”来代替污蔑鲁迅先生的“尖酸刻薄”一语，“鲁迅的一支‘深刻锐利’的笔，透入了教授、学者的骨髓和‘苍蝇蚊子’的灵魂，并且触着了他们的疮疤，因而使他们感觉不快！这就是‘绍兴师爷’‘刀笔吏’‘尖酸刻薄’的来由！”

总之，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底，整个中国沉浸在哀悼鲁迅的沉痛气氛中，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登载着鲁迅逝世的纪念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在这短短三个半月里，全国各大小报刊发表的鲁迅逝世纪念文章，计一千余篇，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仅收录了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我们所编的《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十二月底〈鲁迅先生纪念集〉之外的鲁迅逝世纪念文献选编》，也仅补充了部分我们所能找到的要文。在这纪念文献资料的汪洋大海中，除了以上所述的代表某种倾向的文章之外，值得注意的文章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史实方面：

鲁迅逝世后，他的亲友纷纷回忆他的生平。由于这时回忆的史实距离时间较近，忌讳又较少，所以具有较强的史实可靠性。其中最重要的，当然首推许寿裳的两篇文章：《怀亡友鲁迅》和《我所认识的鲁迅》（都载十一月十六日《新苗》第十一期）。这两篇文章回忆了作者与鲁迅三十五年的交往，高度评价了鲁迅学术研究的深邃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成为后来鲁迅生平史实研究的基本文献。特别是首次披露了青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时期探讨中国国民性的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

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后来经常被鲁迅研究者所引用，几乎成为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要领，在鲁迅史实研究和思想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当推周作人以知堂名义发表的《关于鲁迅》（十一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二十九期）和《关于鲁迅之二》（十二月一日《宇宙风》第三十期）。这两篇文章，虽然也有前文所说的偏见，但是在鲁迅早期生平史实方面提供的资料是第一手的，经过历史的验证，证明是属实的，在鲁迅史实研究和传记写作上具有重要价值。再次，有些回忆文章虽然仅仅记录了与鲁迅的一面之交，却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鲁迅的生活侧影，值得注意。例如陈云同志以史平名义发表的《一个深晚》（十月三十日巴黎《救国时报》），记述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个深晚、协助瞿秋白同志搬迁、会见鲁迅先生的史实，真切感人，令人难忘。阿累的《一面》（十一月五日《中流》第一卷第五期），记述了作者作为一个电车售票员，到内山书店购买革命书籍，受到鲁迅热情照顾的史实，至今读来，仍然温暖。这一类纪念性的回忆文章，从各个侧面烘托出了真实的鲁迅的高大形象。

第二、认识方面。

在鲁迅逝世纪念中，很多纪念文献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力图探索鲁迅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齐燕铭在《鲁迅先生在历史上的地位》（十月二十七日《民国学院院刊》第六期）中，对鲁迅和章太炎两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比较，认为：“鲁迅先生的死比起章先生的死，对于今日民族革命运动上，其损失更为巨大。今日纪念鲁迅先生应当从历史的任务上认识鲁迅先生的地位之重要。”问题是提出了，也进行了一定的历史比较，但是认识的起点还不够高。只有从整个中国现代史的演变上去了解鲁迅，才能正确地认识他的历史地位。中国文坛巨匠们就是这样认识的，郭沫若在《民族的杰作》（十一月十日《质文》第二卷第二期）中说：“中国文学由先生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是以先生为真实意义的开山，这应该是亿万人的共同认识。”“鲁迅先生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茅盾在《研究和学习鲁迅》（十二月一日《文学》第七卷第六期）中说：“如果我们把他仅仅当作民族文化史上的‘伟人’来研究，他在地下一定要说明我们‘太乏’；我们必须承认：他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他是‘中国民族有前途的明显的保证’。”而郁达夫在《怀鲁迅》（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七卷第五期）中所说的那段认识本民族伟大人物的名言，则在中华民族认识鲁迅价值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众多旨在认识鲁迅历史地位的纪念文献中，还有一篇以学术理论思辨见长的论文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就是欧阳凡海的《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几个基本认识的商榷》（十二月一日《文学》第七卷第六期）。这篇论文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辩证地分析了鲁迅性格的两个方面：悲悯和善与怒目执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真挚浓烈的感情与冷静的观察等等，具有较强的理论说服力。特别是在第六节中提出要研究鲁迅的思维方法问题，对鲁迅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可惜是五十年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第三、学术方面。

在纪念文献中，也有一些在鲁迅思想、作品的学术研究方面谈出些见地的文章。例如孙伏园的《谈〈药〉——纪念鲁迅先生》（十一月十日《民间》第三卷第十三期），对鲁迅的小说《药》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并披露《药》是受过安特莱夫《齿痛》的影响，对于理解鲁迅小说的思想含义以及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是有裨益的。张若英的《作为

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十一月二十五日《光明》第一卷第十二期），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方面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更为深入、详尽的评述和论析，有一定的份量。十一月五日，远在西安的《西北文化日报》上发表了达城的《鲁迅研究大纲草目》，对鲁迅研究的长远规划作出了非常周密的设想，在鲁迅研究学术史上是有价值的。

一个作家的逝世纪念持续的时间这样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到了一九三七年，报刊上仍然继续发表悼念鲁迅的文章。一月一日，《宇宙风》第三十二期发表了林语堂的《悼鲁迅》。林语堂曾是鲁迅的老朋友，后来虽然发生齟齬，还不至成为仇敌，然而侨居美国的林语堂所写的这篇悼文态度却不够友好，半文半白，尖酸刻薄，文风不正，作为一种资料，也反映了林语堂这类人物的鲁迅观，应当注意。

一月十日，南京出版的《生活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郭光的《我所见到的鲁迅——在中央大学文艺研究会鲁迅追悼会报告》。这篇报告相当全面地概括了鲁迅的生平业绩，相当准确地汲取了鲁迅逝世纪念文献中对鲁迅评价的科学成分，更为完整、系统地表现在文章中。该文指出：“鲁迅底一生，是一首崇高伟大的诗篇，是一首英勇悲壮的凯歌。他底脉搏，和中国民族底脉搏一致，和全世界前进人类共感交振。”

“假使我们只把鲁迅当做个写写文章译译书的优秀作家，那是贬低了他的价值。在民族解放运动里，他是一个最英勇最坚决的战士。他是‘中国民族有前途的保证’，他是‘真理胜利的征兆’。”这篇报告后来收入了《鲁迅先生纪念集》，可见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鲁迅的作品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而且受到国外、尤其是日本人民的热爱。鲁迅逝世后不久，日本改造社就决定编译、出版《大鲁迅全集》。一月十六日，《译文》第二卷第五期报导了这个消息。这无疑对国内的鲁迅研究工作者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在国内的鲁迅生前好友许寿裳等人为了使广大群众深入了解鲁迅，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许寿裳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所作的报告：《鲁迅的生活》（一月十六日、二月十六日《新苗》第十三、十四期），完整、准确地叙述了鲁迅一生的梗概，几乎可以成为一部鲁迅传的提纲，很值得注意。

从不同的审观点观察鲁迅，就会得出不同的鲁迅观。有些持资产阶级文学观念的专家、学者，本意可能并非攻击鲁迅，甚至还佩服鲁迅的文学成就，但是一加评论就可能有所歪曲，叶公超的《鲁迅》（一月二十五日《北平晨报》）就是其中一例。叶公超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平心而论，他的这篇文章不能算是全部在攻击、谩骂鲁迅的，其中拿鲁迅的杂感与英国斯伟夫特的讽刺小品进行比较的论述，虽有偏颇之处，但是并非全无道理。从与英国随笔的比较中认识到：“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十四册中，除掉谩骂，嘲戏，以及零星小品之外，还有委实耐读的文章在。在杂感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约束，所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杂着别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锋锐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知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虽然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使叶公超不可能理解鲁迅杂文的战斗性，但是部分地看到鲁迅杂文的耐读性，体味出一些妙处，总比全盘否定鲁迅杂文的陈西滢等人要强得多，应当部分地加以肯定。

对鲁迅的杂文持彻底否定态度的并不是叶公超，而是毕树棠。他在《鲁迅的散文》

(二月一日《宇宙风》第三十四期)中认为：“若以鲁迅和其他作家比较，当以小说为主要，散文次之，杂感是他的独造，殊难与他人相提并论，其实只可算是他的散文的糟粕。”“在艺术上，他是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到他晚年，似乎已没有灵感了。”这一观点，倒是鲁迅否定派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并且有一定市场，鲁迅研究工作者应该认真加以注意，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公开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露骨地攻击、谩骂鲁迅的还是苏雪林。三月一日，在武汉创刊的《奔涛》第一期上刊登了胡适和苏雪林的通信《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苏雪林在信中大骂：“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象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这种色厉内荏的谩骂，倒从反面证明了鲁迅人格、著作的伟大和他在广大青年中的崇高威望。之后，苏雪林又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公开攻击鲁迅的文章：《〈理水〉和〈出关〉》(三月一日《文艺月刊》第十卷第三期)、《与蔡子民先生论鲁迅书》(三月十六日《奔涛》第一卷第二期)等。为了证明她反对鲁迅并非自今日始，三月十五日又在武昌的《文艺》月刊第四卷第三期上发表了四年前写的《论鲁迅的杂感文》并加了长长的附言，继续污蔑鲁迅。然而无论她怎样解释，只能证明她后来转而攻击鲁迅，完全出于政治原因。当初她也曾为鲁迅杂文的艺术力量所感染，称赞道：“在《热风》里有许多文字，宛如高山峻岭的空气，那砭肌的尖利，沁心的寒冷，几乎使体弱者不能呼吸，然而于生命极有益。”难道写出这样高尚文字的鲁迅先生，后来竟如苏雪林所污蔑的那样吗？

鲁迅逝世纪念实质上也是不同阶级鲁迅观激烈交锋、尖锐冲突的战场。苏雪林对鲁迅的公开攻击正是资产阶级右翼文化阵营反动政治观点的亮相，是两种根本对立的鲁迅观尖锐冲突达到白热化的反映。

左翼文化阵营对苏雪林等右翼文人对鲁迅的攻击和谩骂自然不能等闲视之，李何林等同志接连写作了一系列文章予以回击。这些文章计有：《叶公超教授对鲁迅的谩骂》(三月二十日《文化动向》第一卷第二期)、《谈谈苏雪林女士论鲁迅：〈鲁迅打落水狗我却要打死狗〉》(四月九日《北平新报》)以及洪星的《苏雪林的鲁迅论》(四月十一日《北平新报》)等，从声势和舆论上都压倒了苏雪林等右翼文人对鲁迅的攻击。

而这时从正面、从更高的学术理论审视点上论证鲁迅历史地位的，则是三月二十五日，冯雪峰以武定河名义在《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上发表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这篇文章是鲁迅生前审阅过的，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冯雪峰在这篇文献中指出：

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他的。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这是鲁迅的特点，也说明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特点。现代中国社会，是这样的社会！鲁迅的巨大的艺术天才，显然担得起世界上最著名最伟大的那些创作长篇巨制的作者的荣誉，但社会和时代使他的艺术天才取另一种形态发展，所以他除了五本创作(小说，散文诗)以外，没有更多的创作，而是以十余本的杂感评论和散文代替了十余卷的长篇巨

制。但他的十余本杂感集，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比十余卷的长篇巨制也许更有价值，实际上是更为大众所重视。这就是在现代中国，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写实主义作家的特点。他的杂感，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和文苑里为独特的奇花，也为世界文学中少有的宝贵的奇花。

这段精辟的论述，是鲁迅研究、特别是鲁迅杂文研究的重要指针，也是对资产阶级右翼文化阵营种种攻击鲁迅和他的杂文的胡言乱语的最好回击。

五

(1937.6—1939)

一九三七年六月，夏征农编的《鲁迅研究》一书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是鲁迅逝世后出版的第一部鲁迅研究论文集，是一部专门研究鲁迅生平、思想、著作的的学术文集。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鲁迅研究学术史已从鲁迅逝世纪念的非常时期转入了比较冷静的学术研究阶段。

这本鲁迅研究专集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从生平、思想到杂文、文字改革、写作理论等等都有论述，文章作者也多是研究有素的学者，所以有一定的份量。其中值得注意的文章是：

艾思奇的《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这篇文章虽然还比较浅显，是充分研究之前的准备，然而文章结尾提到的鲁迅思想方法问题却是前人所未论述的。艾思奇这样写道：“这战斗的现实主义，同时也是鲁迅先生的思想方法。他很少谈抽象的理论，却最善于分析事实，他甚至没入到日常的琐事里。他不用理论的公式去套住事实，却爱从事实中找出具体的活的理论。自然，文艺是形象的现实反映，作为一个文艺作家，应该都有具体地表现思想的能力，不是鲁迅先生所专长的。但他的专长并不在于写出事实，而是能巧妙地暴露事实的矛盾。他善于出人意料地点出事物的负面，因此在论战的时候，也最能用论敌所语的话，去打击论敌自己的嘴巴，呈出一幅讽刺的、幽默的，然而却是真理的场面。他没有有意地在讲辩证法，但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地在随时应用。从来天才的思想家都常常要跳出形而上学的方法的禁锢，而对于辩证法的发展多少贡献一些东西。这在鲁迅先生，情形也是一样的——他深化了民族的反抗思想，同时也给世界的哲学添了彩色。”这段精彩的论述对于理解鲁迅的思想是甚有裨益的。“爱从事实中找出具体的活的理论”，“巧妙地暴露事实的矛盾”，“出人意料地点出事物的负面”，“跳出形而上学的方法的禁锢”，这些要领抓住了鲁迅思想方法的重要特点，也反映了鲁迅杂文的辩证思维特征。

徐懋庸的《鲁迅的杂文》。这篇论文在鲁迅杂文研究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是继李长之的《鲁迅之杂感文》之后最重要的一篇鲁迅杂文研究论文，而且明显地比李文提高了一步。该文在研究史上提供的新贡献在于：第一、披露了鲁迅首先强调杂文社会价值的批语，对理解鲁迅杂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最早提出鲁迅杂文的特色是“理论的形象化”这一重要论点，对以后的鲁迅杂文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三、指出李长之仅

看到鲁迅杂文“然而”、“总之”这些字面的转折是浮浅的，认为：“这种现象，不关作法，其实是思想方法所产生的。鲁迅的思想方法，是合于辩证法的，就是，他不照呆板的逻辑，把问题放在孤立的状态中去思索。他把凡和这问题有联系的方面都想到，而且从它的发展状态中去想。”徐懋庸的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对于理解和把握鲁迅杂文的辩证思维特征颇有启发。

如何评价鲁迅杂文、特别是他的后期杂文，是鲁迅研究领域里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为了正确评价鲁迅的后期杂文，驳斥苏雪林的污蔑、周作人的歪曲，八月十日，唐弢在《生活学校》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了《从〈且介亭杂文〉论鲁迅》一文，对鲁迅后期所作的三本《且介亭杂文》进行了分析，说明鲁迅后期的思想“发展到了更前进、更正确的阶段”，有着“坚强的自信力”，并非如周作人等人所说是变为虚无主义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为胡适之、苏雪林之流所不能了解了。《且介亭杂文》是鲁迅后期思想、艺术达到成熟境界时的灿烂之作，是值得进行专门研究的。唐弢的这篇文章是专门评论《且介亭杂文》的第一篇文字，对于《且介亭杂文》的研究具有引路的作用。

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文化界纷纷撰文纪念，并由上海抗战出版部出版了《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册》。一九三七年的鲁迅研究，在周年纪念的气氛中走完了自己的路程。

一九三八年，鲁迅研究史上出现的重要事情主要有三件：

第一件是毛泽东《鲁迅论》的发表。这篇文章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辞，三月份在重庆出版的《七月》第三期上发表。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名演讲辞中指出，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这一论断显然比鲁迅逝世纪念文献中的评价更为精辟，言简意明地概括了鲁迅在现代中国的至高价值和历史地位，也揭示了开展鲁迅研究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第二件是《鲁迅全集》首次出版。早在一九三七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就决定出版《鲁迅全集》，经过共同努力，六百余万言的全集，竟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于八月份由复社出版，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也为鲁迅研究事业的顺利开展准备了基本资料，实乃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第三件是发生在上海“孤岛”的关于“鲁迅风”的论争。这场论争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三八年十月间，巴人接编《申报》的《自由谈》，阿英接编《译报》的《大家谈》。十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巴人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感《抽思》七章，在其中一章无题杂感中写道：“有感必有情，有情则有艺术的凝结力。此鲁迅的杂感之可以为艺术品也。有感必有识，有识则深入而有创见。此鲁迅的杂感几乎每篇等于创作也。”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二周年忌日，巴人又以编者名义在《自由谈》上发表《超越鲁迅——为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作》，借用鲁迅翻译的有岛武郎小说《与幼小者》中鼓励幼者“超越”老者之语，主张“以我们自己的力量，继之以我们子孙的力量，而超越鲁

迅！”同日，阿英以鹰隼为笔名在《大家谈》上发表纪念文章《守成与发展》。阿英对鲁迅杂文持这样的观点：一、六朝的苍凉气概；二、禁例森严期的迂回曲折；三、缺乏韧性战斗精神和胜利信念；四、不够明快直接。他还指摘在《文汇报·世纪风》上写杂文的作者不该写“鲁迅风”式的杂文，盖因现在是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时代，不应该停留在模仿鲁迅杂文阶段，要战斗的，不要讽刺的；要明快直接的，不要迂回曲折的；要深入浅出的，不要隐约而晦涩的。对巴人，则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在‘抽抽乙乙’作‘碎感’……”这样便激怒了巴人，在二十日的《自由谈》上，他发表了《“有人”，在这里》一文，开始了这场争论。二十一日，阿英又以鹰隼名义在《大家谈》上发表了《题外的文章——答巴人先生》，向巴人提出四点质问：一、目前文坛上模仿鲁迅的风气是不是甚盛？二、这种倾向的增长对发展前途是不是有害？三、如果有害，我们是不是应该表示抗议？四、如果鲁迅还在，是不是依旧写这样的杂文？同时要求巴人作“进一步的反省，自己近时的文章有无有意识的模仿鲁迅的存在……如果我的抗议是应该的，巴人先生不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二十二日，巴人又在《自由谈》上发表《“题内话”》，承认当前“杂感”写作的“一般性”，但是又认为“模仿本是创作的必要过程。在今天，我以为对于鲁迅的学习，还不够深入，还不够扩大！没有守成，即想发展，那是取消鲁迅的企图，这正是鹰隼先生所要做的。”为了妥善解决这场革命文化阵营内部的争论，十一月由《译报》邀集阿英、巴人等四、五十位文艺工作者在上海福州路开座谈会，各抒己见，沟通思想。十二月七日，当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负责人的孙冶芳同志，以“孙一洲”为笔名，在《译报周刊》第一卷第九期上发表《向上海文艺界呼吁》一文，呼吁革命文艺界内部停止意气之争，加强团结。同时，孙冶芳同志还就鲁迅杂文的价值问题谈了重要的意见，指出：“显然鹰隼先生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最伟大的革命文学家的文学遗产中重要部分之一——杂文——的重新估价问题。”认为：“我们不仅需要《阿Q正传》这样的小说作品，而且需要鲁迅风的杂文。我们深信鲁迅先生的杂文的意义决不能以孤岛的特殊环境为限。”“只要社会上还需要有革命家存在的时候，鲁迅风的杂文终将为革命家手中的一种有力武器。”孙冶芳同志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他的这篇文章对于鲁迅杂文基本特质的理解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十二月二十八日，《文汇报》又发表了孔另境、柯灵等三十七人联名签署的《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终止了这场论争。

这场关于“鲁迅风”的论争，实质是如何估价鲁迅杂文的价值和本质特征、在新形势下又如何继承它的战斗传统的争论。这是鲁迅逝世后、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的第一次这类争论，以后这类争论还发生过多次，至今有些问题仍然没有争论清楚，需要鲁迅研究工作者和杂文作家们认真思考。

一九三八年度发表的比较重要的鲁迅研究论著还有：

张震欧的《鲁迅与尼采》（八月二十九日《黄花岗》第二卷第四期）。这篇文章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第一篇专门探讨鲁迅与尼采思想联系的文字，虽然还很浮浅，仅限于罗列一些相关的词句，但是到底是开先之作。

王任叔的《鲁迅先生的艺术观》（十月十六日《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一期）。这篇论文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最早探讨鲁迅的艺术观、即美学思想的文字，从“艺术的功利主义”、“艺术的宽容”、“真实与阶级性”三个方面初步勾勒了鲁迅艺术观的轮廓，

分析还较简单。

台静农的《鲁迅先生的一生——在重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一个报告》（十月二十九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八期）。作为鲁迅的生前好友，台静农简明地叙述了鲁迅的一生业绩，有一定参考价值。

周扬的《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十一月七日《解放》第五十六期）。这是周扬写的最早一篇鲁迅研究论文，较前人更为透辟地论述了鲁迅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及他走向无产阶级的必然性。

鲁座（李平心）的《思想家的鲁迅》（十一月十日《公论丛书》第三辑）。这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第一部以思想家为题旨研究鲁迅思想内涵、特点和发展阶段的论著，对于全面地、科学地认识鲁迅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部论著划分鲁迅的思想发展阶段与瞿秋白稍有不同。瞿秋白把鲁迅的世界观转变划在一九三〇年前后，李平心则划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九二七年。

一九三九年度，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鲁迅杂文研究和杂文创作有了扎实、深入的发展。

关于“鲁迅风”的论争，促进了鲁迅所开创的杂文创作运动，鲁迅杂文研究也随之展开。

一月十一日，直接以“鲁迅风”命名的杂志在上海“孤岛”创刊。《鲁迅风》编者在发刊词中说：“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奥秘，使用我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用意了。”这就是说《鲁迅风》旨在探取鲁迅所使用的战斗武器——杂文的奥秘，并运用杂文这一尖锐武器与当前的大敌战斗。《鲁迅风》正是这样一个专门刊登杂文作品和杂文研究论著的杂文刊物。

创刊号上发表的唐弢的《鲁迅的杂文》，既是一篇鲁迅杂文研究的短论，又是一个鲁迅杂文长远研究的提纲，从鲁迅杂文的思想精神到鲁迅杂文的文章作法，都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在当时来说不愧是一篇力作。

一月二十五日和二月一日在第三、四期上连载了宗珏的《文学的战术论——从“鲁迅风”所看到的“孤岛”杂文》。这篇长文实质是当时上海“孤岛”杂文创作状况的述评。宗珏认为上海“孤岛”上杂文创作的繁荣“决不是偶然的事，而必然是有着它的客观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渊源的。忽视了促成这种杂文的特别盛行的社会的因素，否定了它所能赋予‘孤岛’群众的深远和强大的影响，那是对现实的混乱，是主观的观念论的错误根源。”首先强调杂文创作繁荣的社会因素，应当说是见地的。宗珏还对“鲁迅风”论争中关于如何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战斗传统和艺术技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对风子、柯灵等六位杂文作者的思想、艺术风格作了精彩的概括和评析。

六月五日，《鲁迅风》第十五期发表了萧军的《鲁迅杂文中底“典型人物”》。该文认为鲁迅在杂文中塑造了“胡羊”、“落水狗”等典型。当然，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典型”与文学理论中所说的典型含义并不一致，不过倒是鲁迅杂文塑造典型这一流行观点的最早提出者。

全国其它报刊也发表了一些论述鲁迅杂文的文章；

四月十三日，地处偏远的云南日报发表了秋帆的《话杂文》，该文指出：“把社会现象，国际问题，文苑风向……这些种种用抽象的理论去叙述与批判，却不能认为是很好的杂文，甚至不能算是杂文的。杂文，它是‘文艺性的评论’。杂文舍弃了‘文艺性’的重要因素，还能算是‘杂文’吗？”强调杂文的文艺特性，对深入理解鲁迅杂文的特征和促进杂文创作的健康发展都是有利的。

五月二十七日，云南日报又发表了金华的《关于杂文》。这篇文章结合当时形势论述了鲁迅创造杂文这一文体的历史功绩和时代原因，批驳了污蔑鲁迅杂文的谰言，预示杂文创作有灿烂的前途。

七月十六日，在福建永安出版的《改进》半月刊，在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了杜埃的《鲁迅式杂文之再建》。该文认为：“讽刺工作，在整个抗战文艺上仍然是需要，且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发挥它特有的战斗作用。所不同的，今天的讽刺对象有了转变，讽刺的原则有了新的根据。”因此，“目前再次的强调提出‘鲁迅式杂文之再建’，不是无益的吧？”如何既继承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又适合新形势的需要，是鲁迅研究和杂文创作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具有现实意义。

十一月一日，胡绳以绳的笔名在《读书月报》第一卷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学习鲁迅的文体》，文章虽短，见解却很精辟，值得注意。胡绳说道：“鲁迅先生的文体以精炼锋利为特色，这种文体的最具体的表现便是‘鲁迅的杂文’，这是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奇宝，不但‘一时无二’，而且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能说‘后无来者’。”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鲁迅杂文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胡绳的这篇短文启人深思。

在出版的杂文集中，也有一些有份量的鲁迅杂文研究论著出现。七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横眉集》中，收有孔另境的《论文艺杂感》。这篇论文首次追溯了杂文这一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历史渊源以及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发生、发展，论述了鲁迅革新这一文体的历史功绩，认为现在的所谓“杂文”，“是指一种含有文艺性的政治和社会的杂感”，称之为“文艺杂感”最为妥当。为“杂文”正名，弄清这一文体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对于鲁迅杂文研究是重要的。孔另境是较早进行这一工作的研究者。

这一年出版、发表的鲁迅研究论著还有：

《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它》，景宋、巴人等著，十月份由重庆读书出版社作为新中国文艺丛刊之三，《鲁迅纪念特辑》出版。这本小册子所收文章虽然不多，却都很有份量。巴人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全面论述了鲁迅作品的产生过程、典型的创造、环境的描写和文字技巧，过去还没有出现过这样全面、系统地论述鲁迅创作方法的论著。洛蚀文（王元化）的《鲁迅与尼采》，相当全面地评述和分析了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的历史范畴内进行了考察，比较有说服力地论证出“鲁迅精神与尼采主义是代表两种不同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比起张震欧的同题文章来是严整、系统得多了，堪称是三十年代末期出现的一篇鲁迅研究力作。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作者当时刚刚是二十岁的青年，就更为难能可贵了。锡金的《鲁迅与诗歌》，全面评述了鲁迅与诗歌的关系，也是前所未有的。

孔嘉（台静农）的《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十一月十五日《理论与现实》第一卷第三期），全面、系统地评述了鲁迅整理中国古文学的成绩和对古籍整理工作的精辟见解，是鲁迅研究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新收获。

其它还有李何林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十月出版），虽然并非专门研究鲁迅的著作，但是以主要地位评述了鲁迅和瞿秋白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史上的历史业绩，值得鲁迅研究工作者注意。

资产阶级右翼文化阵营仍然不忘攻击鲁迅。十二月二十日，北平的《改造》月刊第十二月与翌年一月合刊登载了李直的《鲁迅的评价》，攻击鲁迅“除了短短的一篇《阿Q正传》勉强算个小说外，其余的都是‘骂街集子’”。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出版物，红色的占了百分之九十九，所以把他们的偶像鲁迅捧的都迷了每个人的眼”。从反面证明了左翼文化和鲁迅著作的强大威力。

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潘公展，也出面作了篇讲演辞：《纪念鲁迅先生的意义》（十二月《文艺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仔细一读就不难看出他其实是在借鲁迅先生的威望，行维护国民党政治统治之实罢了。

总之，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三九年，鲁迅研究从逝世纪念的非常时期转入了比较稳定、冷静的研究阶段，出版了最早版本的《鲁迅全集》，认识到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出现了《思想家的鲁迅》等较有份量的研究论著和夏征农编的《鲁迅研究》、巴人、景宋等著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它》等鲁迅研究论文集，发生过关于“鲁迅风”的论争，推动了鲁迅杂文研究和杂文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为四十年代鲁迅研究的大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 。

（张梦阳 撰写）